

交流与探索

中德学者对德中问题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交流与探索

——中德学者对德中问题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流与探索: 中德学者对德中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ISBN 7-300-04641-X/D·801

I. 交…

II. 中…

III. 中国-对比研究-德国-文集

IV. D829.5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0678 号

交流与探索

——中德学者对德中问题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9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8 00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交流与探索

中德学者对德中问题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于 2001 年 11 月 16 日正式成立。成立伊始,即开始组织中德两国学者着手研究两国的经济、政治、教育、语言、文学、历史、文化以及中德建交前后的历史回顾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一年多以来,在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这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交流与探索》。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本书终于问世了。我们感到十分欣喜。

本书所收著述,论述深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充分说明了中德建交 30 年以来,两国的学者对对方国家在各个领域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正在逐步深入。这对两国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扩大政治文化交流是有积极作用的。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对促进中德友好、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的老一代学者,中德友好协会主席王殊、北京大学教授张玉书、原光明日报驻德国记者陈文奎、德国洪堡基金会主席沃尔夫冈·弗律瓦尔德博士教授(Dr. Wolfgang Frühwald)、原德国亚琛汤若望协会主席、现任名誉主席汉斯约瑟夫·泰森(Hansjosef Theyßen)、德国联邦农业、食品和消费者保护部高级官员里查德·拉莫尔博士(Dr. Richard Lammell)、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托马

斯·哈尼施教授 (Prof. Thomas Harnisch) 等先生都为本书提供了大作。在此，我们向各位老一代学者，向本书的各位作者表示真挚的敬意和谢意。

中国与德国，都是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我们热切期望两国能够日益加深了解，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促进两国共同走向繁荣富强。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也是出版本书的目的。

本书成稿时，恰逢中德建交 30 周年，我们仅以此书献给这一重大的盛典。

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赖志金教授

2002 年 10 月 11 日



目 录

交流与探索

中德学者对德中问题的研究

前 言

I

回忆录

中德建交的前前后后	王殊	3
德中关系沉浮史	汉斯约瑟夫·泰森	39
难忘的经历 美好的回忆	彭肇兴	51

经 济

中国林业印象		
——德国人看中国的林业	里查德·拉莫尔	67
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对中国		
改革的借鉴意义	陈秀山	72
坚持分散化原则 注重政府与民间		
力量合作		
——德国对中小企业对外经济促进		84
政策初探	史世伟	
展览会王国——德国	杜荣	105

德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白靖宸 120

政 治

聚焦德国问题

连玉如 129

德国政治基金会研究

闫谨 146

教 育

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留学生交流

托马斯·哈尼施 163

德国教育制度初探

陈文奎 174

中德教育合作与交流 30 年

姜锋 刘立新 193

中德教育改革的现实意义

——对建立德语专业多元化

教学方式的思考

陈健平 199

语言文学

德语——科学的语言

沃尔夫冈·弗津瓦尔迪 211

浅谈 21 世纪中国日耳曼语教学

和中国日耳曼学者的任务

张意 224

再论歌德笔下浮士德的进取精神

——中德文化交流中一个历久

弥新的永恒话题

赵蕾莲 232

历史文化

开辟中德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在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张玉书 251

中德发展合作中的跨文化交际 问题探析	潘亚玲	254
亚当·沙尔(汤若望)和他的 《主制群徵》	赖志金	265

回忆录



中德建交的前前后后

中德友好协会会长 原驻德大使 王 殊

一、中德之间的第一件大事

30年前，1972年10月11日上午9时，人民大会堂东厅里灯火辉煌，众多的联邦德国客人都是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对这座宏大壮观的建筑称赞不已。五六十位中国、联邦德国的记者都早已等候在那里，准备采写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第一件大事。双方为了加深两国建交的重大意义，商定两国外长先签字再会谈。中国外长姬鹏飞在大厅门口同早一天到达北京的联邦德国外长谢尔握了手，一同走到大厅中央铺着红绒布的长桌前，在摄像机、照相机的闪闪灯光中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从而为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谢尔是联邦德国的副总理兼外长、自由民主党主席，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后于10月10日下午到达北京。双方对这次访问都很重视，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

理亲自制定了接待方案，德方也派遣了由 39 名成员组成、29 名记者随行的庞大代表团，并事先派出了先遣组。签字仪式后，两国外长走入会议厅进行了简短且意味深长的谈话。谢尔对姬鹏飞的邀请表示感谢，说他能够作为联邦德国政府的第一个领导人访华，并在建交公报上签字感到十分荣幸。姬鹏飞对他说，我们的签字仪式虽然只有短短的 15 分钟，但反映了我们两国 1949 年建国以来特别是这两年加强接触以来所做出的共同努力，在这 20 多年中，我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没有接触到有接触，终于在今天完成了建交的大事，我同你一样感到非常高兴。

李先念副总理当天下午同谢尔外长举行了会谈。谢尔表示联邦德国政府十分重视两国正式建立关系，希望今后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李先念说，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也非常关心两国关系的发展，相信双方的合作关系将会得到加强。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谢尔及其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让联邦德国客人和参加宴会的各国驻华使节和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在宴会上乐队演奏了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乐曲。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乐队早已不再演奏西方乐曲，这是第一次恢复演出，使客人感到非常震惊，西方记者更作了大量的报道。其实，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他很重视同联邦德国的关系，按照总理一贯严谨、仔细的工作作风，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有关单位的会议，检查接待谢尔外长的准备工作。在结束时，他突然提出，在欢迎晚会上是否可以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大家对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滚滚寒流中提出演奏《欢乐颂》，先是大吃一惊，后来领悟了他的用意，一致表示同意。他就要求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打电话问中央乐团李德伦同志是否能演，李说乐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不再练习西方乐曲，而且很多人也已去了干校，在短短几天内不可能演奏交响曲，他建议在宴会上演奏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短曲子。周总理同意了这个建议。自此以后，在欢迎外宾的宴会上又恢复了演奏外国音乐家作品的惯例，此事终于引起了“四人帮”的恼怒，不久发动了矛头针对周总理的批判“无标题音乐”的运动。

13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了谢尔外长。周总理谈到了对国际上一些重大问题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后说，两国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崭新的一页，今后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两国可以合作的方面很多，特别是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他指出，联邦德国始终没有同台湾建交，这是已故总理阿登纳的有远见之举，令人钦佩。

周总理在谈到德国问题时说，德国问题应按照两个德国的人民的愿望，由两个德国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协商解决。他还表示，中国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谢尔对我国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立场表示感谢。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新政府1969年成立后推行新东方政策，大力改善同苏联、东欧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两个德国也拟定了同时加入联合国的计划。联邦德国估计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投反对票，但是在中苏关系恶化、同我国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感到对此没有完全的把握。因此，谢尔这次访问的目标之一也是试探我国的立场。

当天晚上，谢尔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德方对在中国的第一次正式宴会很重视，所有的食物、酒类和饮料都是从联邦德国用飞机冷藏运来的，还派来了获得金奖的厨师长烹调正宗的德国大菜。李先念副总理及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宴会，德方邀请了很多中国客人，但可能由于对中国没有足够的了解，也由于德国人拘谨的作风，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一再邀请周总理出席，因而错过了再次同周总理晤面的机会。其实，周总理从两国关系考虑，曾告诉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如果德方邀请，他是准备出席的。中国客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对西餐已是久违了，虽然冷藏运来的德国大菜不怎么样，仍吃得津津有味。

谢尔外长在北京访问4天后于15日回国。本来我们邀请他到外地看看，他表示感谢，说这次访问印象很深刻，也想多看看，但因为国内大选在即，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只能留待下一次了。

二、往事回首

我原来是新华社驻联邦德国波恩的记者，是在1969年12月去那里工作的。新华社早在1958年就同德意志新闻社就互派记者达成了协议，并在波恩建立了新华分社。我到波恩后，除了新闻报道外，还要做好外交上了解情况和转达联络的工作。我先后就欧洲局势和两国关系给国内写了几篇报告，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1972年7月，我在北京时，周总理同我谈了多次，毛主席也接见了我。8月，两国决定在波恩举行建交谈判，外交部照会德方任命我为中方的谈判代表。结束后，周总理又指示调我到外交部工作。谢尔外长访问结束后，我就到外交部办了手续，正式调到外交部工作。我被任命为驻联邦德国使馆的参赞，在12月1日作为临时代办率建馆小组到达波恩筹建使馆。不久，双方都任命了老资格的大使，我方是王雨田同志，德方是保尔先生。从此，我离开已工作了24年的新闻工作，成了外交队伍中的一员。

我到新华社波恩分社工作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機會。回想起来感慨万端。我过去一直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不懂德文，也没有研究过德国问题。当时，德国问题包括柏林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焦点，情况很复杂，变化也很快，国内对此极为重视和谨慎，各单位都有专门的同志负责处理两个德国的事情，局外人一般是不过问的。因此，1969年10月新华社军管小组的负责同志通知我去波恩分社工作，并且要在年底之前赶到，使我大感意外和吃惊。

当时我回国已有4年多了。1964年我从古巴回国，领导上本来要我去南美担任常驻记者，但好多国家都不给签证，因而到四川参加了一期“四清”运动。后来又要我去英国伦敦，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成了新华社“黑帮”的“红人”，而且还是“三反分子”，在社内的劳改队劳动了整整两年。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虽然得到“解放”，恢复了工

作，但我已万念俱灭，根本没有想到再会出国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华社驻外机构大多陷于瘫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到新华社驻墨西哥记者的情况。参加会议的新华社同志说，他早已回来参加“革命”了。周总理很气愤，批评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当时，绝大多数新华社国外分社的记者都已回国，有些分社空无一人，有些只有个别翻译、报务员或者工勤人员看家。周总理责成新华社军管小组负责人立即派出记者，恢复国外分社的工作。从那时起，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新华社的国外分社才逐步恢复工作。

那时，我已知道社里将派我到国外工作，但我估计是派我到熟悉的英语或法语国家去，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去联邦德国。军管小组的同志向我解释，现驻波恩的记者项前同志刚刚确诊患了癌症，要马上回国手术治疗。在波恩的中国新闻单位只有新华社一家，不能没有记者在那里。当时“极左”思潮泛滥，一个记者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多，才能审查完毕，再决定能否出国。要找会德语的记者已来不及办理手续，而我出国手续当时已全部办妥，因此要我去顶一个缺，等以后物色到合适人选再去接替我。很多老记者看到我终于得到通过非常高兴，向我祝贺，鼓励我到国外后努力工作做出新的成绩。我也表示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虽然困难很大，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赶到波恩时，已是1969年最后一天的中午。

三、内外情况

我在1969年底离开北京到波恩时，国内外情况都很复杂。“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已达到了高潮。新华社的很多干部被批斗、挨打和关押，气氛十分紧张。同时，在国际上，除了美国的敌对外，苏联大军压境。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和报刊纷纷幸灾乐祸地推测苏联

要改变战略进攻中国。苏联的战略究竟是继续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还是转而向东进攻中国，在国内外都有不少不同的议论。

在西欧地区，我国只同法国、瑞士有外交关系，而与英国、荷兰只有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当时，这些使馆的大使和主要外交官都已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使馆工作实际处于瘫痪的状态。有的使馆虽然后来国内派来有经验的外交官担任代办，但由于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也一时很难发挥作用。我国同联邦德国没有外交关系，双方一直很冷淡，没有什么往来，贸易额也很小，双方了解很少，误解却很多。1969年9月，联邦德国社民党战后第一次在大选中成为最大的党，同另一个小党自民党组成了以社民党主席勃兰特为首的联合政府，战后一直执政的联盟党第一次成了反对党。勃兰特上台后宣布实行在大选中大力鼓吹的新东方政策，同苏联、东欧和民主德国改善关系及加强合作，却始终没有提到同中国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究竟有什么考虑，我们也不清楚。

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家，没有其他的机构。我的前任项前同志是一位有经验的记者，英文和德文都不错，而且在民主德国担任过多年的记者，但他是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到这里的，当然受到国内运动的种种影响和限制，很难对外展开工作，后来又身体不好，最终确诊是淋巴癌症，因此只能尽快给我交待工作，以便回国治疗。我第一次到西方发达国家工作，工作环境是完全陌生的。我虽然懂一些英文和法文，可是不懂德文，在联邦德国没有英文、法文报纸，也没有英语、法语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我同我的前任一样，在工作上又受到国内“极左”思潮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要非常谨慎小心才行。

四、困难重重

新华社波恩分社只有三个人，除了我以外，还有翻译和厨师，他们也是新轮换来的，比我早到四五个月。翻译同志是一位年轻

人，在新华社的外语学校只学了两年德文，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耽误了三年，能看懂一些，听说都很差，而且还是刚开始做新闻工作。分社工作困难之大可想而知。我思想上压力很大，一连许多个夜晚睡不着觉，真是有些后悔接受了这个任务，可是一想到周总理的厚望，总社的嘱咐和老同志的期望，心中就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应该振作精神，提高信心，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把工作做好。

驻外记者的工作与外交外事工作当然有所不同，但有重要一点是相同的，即：要大力开展对外活动，实事求是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新华社早就规定，驻外记者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面采访，坐办公室不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与其他的老记者一样，在多年的国外工作实践中，深感这条规定十分重要。记者只有在对外活动中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做好新闻报道工作，要提高自己的本领，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抄报纸、听广播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就像过去每到一个新的国家一样，走出办公室去寻找朋友，建立友谊。除了与官方机构的新闻负责人和一些重要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联系外，我还根据两大本德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名册，给他们打电话，约时间去拜访他们。如果他们懂英语和法语，我就一个人去，否则，就同翻译一起去。大多数记者对我们很友好、热心，给我们谈情况和介绍朋友。经过几个月，我认识了 100 多个记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好朋友。我们还拜访了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驻德使馆的新闻秘书，从此他们有招待会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邀请我们参加，使我们增加了对外接触的机会。我同德国政界、经济界人士也有了初步的接触和往来。在波恩和周围几个大城市，时常有一些国际问题的讨论会，我也尽量去参加，很多是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对我很方便，还有些是德语的，我就收集会上的发言稿，带回去请翻译同志看。

同时，我们也加强了德文的学习。当然外文只是一个工具，可是没有这个工具，工作实在难以开展。我当时已 45 岁，再学一种新的外文确实很吃力了。但走上这个工作岗位后，不懂德文实在无法胜任工作，最终下了决心来学，而且我有其他外文的基础，